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 山西古籍出版社

工日金全要字全止爾書甘原十三年
大至清少工申自生天黃二大應令
無暇中漆于三主錄令乃左林
餘士與中岳錄光王命室介
堂世與承命錄用蕭書賦五所由
望文制月為因習者人十
十五止

近思录



博學工作室

I211/30
:2(1)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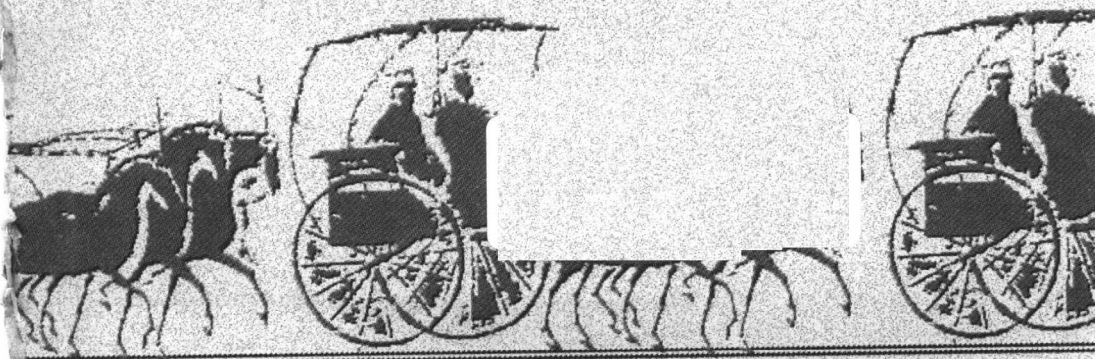


博学工作室

近思录

〔宋〕朱熹 吕祖谦／编订 王华宝／译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宋)朱熹,(宋)吕祖谦编;王华宝译注.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1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

ISBN 978-7-80598-777-4

I. 近… II. ①朱…②吕…③王… III. ①理学
—中国—南宋②近思录—译文③近思录—注释
IV. B24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237 号

近思录

编订者:[宋]朱熹 吕祖谦

译注者:王华宝

责任编辑:李永明

装帧设计:冀建海

出版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网址: www.sxskcb.com

经销者:新华书店

承印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0.875

字数:300千字

印数:1-5000册

版次: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598-777-4 K·266

定价:12.00元



前言

《近思录》是我国南宋哲学家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一部理学入门书,是一部重要的后人了解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选辑著作。该书据《论语·子张》子夏所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义命名。近思,就是从自身日常事务出发去思辨,循序渐进地来思考问题。朱熹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十五)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读书与做人》)并曾在学术文化讲座中谈到,古代有关人生修养的必读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这七部书。把《近思录》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可见《近思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影响之大。

一、作者生平

《近思录》为朱熹与吕祖谦二人所共同编订,朱熹为主,吕祖谦为辅。但后来《近思录》的注解者,却大都不提吕祖谦。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守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云《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晚号遁翁,别号考亭、紫阳,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死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去世数年后赐谥为“文”,世人尊称“朱文公”。朱熹是我国古代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他在哲学、经学、教育、语言、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朱熹又是我国古代继孔



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见清·全祖望《宋元学案》）著称。朱熹在理论上以孔孟之道为本，又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长期在崇安、建阳讲学，历史上称朱熹的学派为“闽学”，并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共同构筑了宋代道学的理论体系，朱熹也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成果可参《朱子全书》等。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号东莱，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编修官，与福建朱熹、湖南张栻（1133—1180）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不宗一师，不私一说，较为博杂，人们认为其学以关、洛为宗，旁稽载籍，兼总众说，自成一家。吕氏为婺学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东莱集》、《吕氏家塾读书记》、《东莱左传博议》、《东莱书说》、《大事记》等等。

《近思录》以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四人的言论为主体内容，因此简述一下这四位理学大师的主要思想，以便阅读。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晚年建书堂于庐山，堂前有溪，称濂溪书堂，故人称濂溪先生。周敦颐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但影响较大。《太极图说》阐释了宇宙本原及其生成过程，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理学的基本范畴。《近思录》及以后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等书都以周敦颐《太极图说》居首，成为理学的基础，而周敦颐本人则被推崇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与其弟程颐并称“二程”，建立了二程学派，因他们出生于洛阳，故称为“洛学”。二程兄弟早年随周敦颐学习，以倡明道学为己任。现存著作有《明道文集》五卷。其中尤以《定性书》、《识仁篇》、《论十事札子》等影响最大。游酢、谢良佐、吕大临、杨时，被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主要著作有《伊川



易传》、《语录》等。程颐认为性即理,理无所不在;人因气禀不同而有智愚之别,主张通过反身内求以体认天理;强调理欲之辨,提出存天理而去人欲。程颐一生主要从事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弟子众多。二程之学,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以至朱熹,蔚为理学大观。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世居大梁,因久居陕西眉县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因讲学关中地区,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重要著作有《正蒙》十七篇、《经学理窟》、《横渠易说》等。在哲学上,主张以气为主,气充塞宇宙,太虚即气。气聚散升降的运动均体现理,这就是太和。气生成变化为天地万物。在认识论上,张载区分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在人性论上,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变化气质之性而回复到纯然至善的天地之性。张载为学注重实践,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并明确表达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来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张载独树一帜的思想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主要内容

本书依次辑录北宋新儒家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四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语录,而朱熹作为编选者之见解自然也多有反映,故此一书实可囊括北宋五子及朱子一派学术之主体。朱熹《近思录前引》曾述编撰意图说:“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

《近思录》十四卷,总成于淳熙二年(1175),起初只言其大纲,而无目录。朱熹说:“《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纲;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



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辨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朱子语类》卷一五）现在通行的《近思录》十四卷目录，为朱熹再传弟子叶采撰《近思录集解》在朱熹上述纲目的基础上加以订立。此后相袭沿用，把《近思录》分门别类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四卷。这基本上体现出朱熹的设想。

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分析说：“全书总分四部分，第一卷，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二至四卷，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与修养论；五至八卷，论大学之道；九至十四卷，杂论儒家之学。概括了四子的政治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反老佛异端思想等，具体而微地构造出了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二程理学体系。”

《近思录》全书十四卷，凡 622 条，选语出自四子著述共 27 种。所选语要的条数多少依次为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因为二程著述相对较多，所以在《近思录》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大。

《近思录》的内容编排，每卷均以周敦颐为始，继之以二程兄弟，张载为后。虽然张载较二程兄弟为年长，似乎应该先于二程兄弟，但在朱熹心目中，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是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提供了理学的主要理论建构，张载则是理学思想的必要补充。《近思录》没有收录北宋另一位著名理学家邵雍（1012—1077，字尧夫，赐康节，人称康节先生）的言论，这是因为邵雍之学基本上为《周易》理数之学，道家气味太浓，却极少涉及儒家特别重视的仁义等基本问题。《近思录》全书只有一处提及邵雍（《近思录》卷五《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并不能全部辑录北宋理学家的主要论点，而是经过朱熹慎重考虑而有取舍、有简择的节选本。

《近思录》编辑原则主要是根据朱熹的哲学理念及其道统观。全书紧紧围绕“性理”之学，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首选，表达了儒家由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的宇宙论生成模式，而后再至圣人确立人道法则的人生论，全面、完整地体现出宋儒性命义理



之学的思想体系,集中阐述了儒家内圣外王修养实践功夫论,成为指导儒家学者开物成务、内圣外王的范本,此书实为“性理”诸书之祖。《近思录》一书可称是后人了解宋代理学基本构成的重要选辑著作。

《近思录》的分类编排、次序规模以及所体现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朱熹“集大成”的理论设想,从中可以看到朱熹综合北宋五子之学的理论努力,也可以从中看到朱熹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

三、《近思录》的历史地位

《近思录》历经元、明、清几七百年而不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近思录》十四卷,总括了宋代理学周敦颐濂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三家语要,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称之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近思录》实际上是一部理学纲要,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儒家发展的新时期——宋明理学时代的思想格局。宋明理学绵延数百年,《近思录》一书的流传与影响也经久不衰。

《近思录》所辑录的内容基本上体现了理学的思想义理,各卷之间有脉络可寻,在很大程度弥补了“语录”体散乱的不足,不仅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选辑,而且也为初学者探究理学思想提供了一部提纲挈领式的入门书。于此可切实体会朱熹所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近思录》的编排体例,奠定了明永乐十三年(1415)钦定《性理大全》的体例。而《性理大全》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止,一直是我国科举取士的重要教本。《近思录》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历史影响,还表现在续作极多。陈荣捷先生曾对此情形概述说:朱、吕编成《近思录》后,“朱子讲友刘子澄即编《近思续录》。至明而有高



攀龙之《朱子节要》，至清而有张伯行之《续近思录》与《广近思录》等等十九种。或辑二程子门人，或选宋明理学家要言，或专采朱子精语，皆依朱子之《近思录》分十四目。《近思录》之内容形式竟支配哲学选录之风气达七八百年。”（陈荣捷：《朱子之〈近思录〉》，见《朱学论集》1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影响所及，亦操纵韩国与日本思想数百载，且成为官学。”（见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可见《近思录》影响之深之大。

四、本书整理说明

本书以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参校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全书简体字横排，参考各书，每卷卷首作简要的题解，每条后注明原文出处。全文作简注、翻译，注释以简明易懂为旨归，译文以直译为主，尽可能保持原作情调和口语特色。

书中的讹衍脱倒，校点整理时参照众本，加以改正，在注释中说明。底本文字与他本有异，但文义俱通而难判是非者，一律不改字，不出异同校。传刻过程中出现的避讳字，一律改正，并在首次校改时作注说明。原本使用的避讳字，一般不改。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不出异同校。异体字、俗体字径改为通行的正体字，易引起歧义的则不改。本次整理，参考了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陈永革注评本《近思录》、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等多种新旧整理本及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本次整理力求文字正确，标点准确，注释简明，译文流畅，篇章条理清晰，版式疏朗醒目，便于阅读。限于学识和时间，体例或未完善，注译或有不当，谨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王华宝

2006年8月



序

董 平

当我们带着一种历史感去回顾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历史过程中的传承与更新，我们总会感受到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思想创新的举步维艰，而不禁对那些贤人君子高尚的思想格调与浑厚的文化情怀肃然起敬，不禁对他们博厚的学问根基、深邃的思想洞见、超迈的人格精神、深沉的人世关切以及那种必欲将世道人心导向光大高明之路的卓越努力肃然起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因有历代诸多的以文化传统的自觉传承为己任而不惮劳瘁的贤人君子，我们的文化才能够延续它的传统慧命，能够在保持它精神血脉统一性的同时而又呈现出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并时时迸发出光耀人心、启人智慧的思想华彩。

宋代理学的发生，也原本于这样一批贤人君子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劳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这句话，不是空言，而的确是代表了当时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继承圣人之道为己任的高远心态的，并且实质上也正代表了理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本身的基本目的。大家都晓得，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足发展，它逐渐适应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氛围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情态，在思想观念上它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有过实际的交涉与整合，从而形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形式的初步完成，大抵可以隋代智顗大师创立天台宗为基本标志。唐代的佛教，因此就进一步沿着“中国化”的方向继续深化与发展。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宗派相继成立，各种学说遍满天下，



等到慧能创立南宗禅以后,禅宗这种新兴的佛教形式,因为它的简明扼要,没有繁琐的理论与众多的名相,而只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影响就超越其他各宗,非常迅速地在人群中普及开来,知识分子当中“逃禅”的风气也愈加浓厚。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传播与普及,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阐明的“圣人之道”显得并不那么突出,“圣人之道”存在着因佛教道教的强力冲击而被淹没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与慧命潜存着被动摇与断绝的危险性,这一时代的思想现实引起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极大忧虑,“圣人之道”问题被重新提起,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算韩愈,他写《原道》一篇文章,竭力提倡要重新寻回儒家以仁义为本质标志的圣人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激烈地反对佛老之说,甚至认为应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虽然韩愈这种对待佛老之说的极端的对抗性态度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实际效果,因为思想文化观念的分歧的确也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所能恰当处理的,但他首先提出的“道统”问题却引起了后人的充分关注。到宋代,关心同样问题而要承当起圣人传统的知识分子,遂接过他的“道统”理念而继续予以发扬光大,由此而开启了规模浩大的理学思想运动。

周敦颐被认为是理学的开山祖,张载、邵雍、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等人,则是理学运动的思想中坚。到南宋时朱熹出世,则一方面继承着先贤的思想(特别是程颐),另一方面又以他个人的渊博学识与精深思考,完成了理学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理想具备了实际规模,理学也成为儒家学说一种全新的历史形态,并对中国此后数百年的思想文化保持着绵远而恒久的影响力。从周敦颐到朱熹,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经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思想经历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泛观博览,优游于中国固有思想的各家学说;同时又出入于老释,沉潜于佛道义理的深邃幽妙;最后反求诸《六经》,而回归于圣人之道的博厚高明。因



此就宏观的方面来说，理学是当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因佛教的全面发展与繁荣而面临着重大挑战的时候，以儒家原有的思想为本位而对佛教（以及道教）义学所作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回应。它既是对佛道二教的本质解构，却又整合了佛道二教的思想精华；既是先秦儒家学说的本质回归，却又是在新的历史情境当中对原始儒学全面的重新建构。在舆论的形式上，理学家高扬起圣人“道统”的大纛而对佛道之说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要求世人重新回到圣人早已指明的尽心知性、由下学而上达天德的光明大道；同时诉诸儒家经典的重新研究，潜玩深省，探幽发微，对经典的义理给予结构性的重新理解与阐释。事实表明，他们的艰苦努力取得了思想创新的伟绩，非但重续了往圣的“绝学”，使儒家学说重新焕发出了它的生命之光，使圣人之道终于深入人心，并且为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规模。

在思想实质上，理学应被看作是对孔孟原始儒学精神的继承。人性问题是理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先秦儒学当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则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典范。我们通常似乎都不太去思考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真相，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世界，因此我们通常也很少去追问除了物质存在的意义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有某种物质需求以外的东西。但在我们文化的圣人传统中，尽管正当地获得物质并享有它们是被肯定的，但同时又非常强调这样一点，即必要的物质满足不过是“人道”的起点，而根本不是“人道”的全部，纯粹物质生活资料的占有，哪怕达到非常丰裕的程度，它也无法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精神愉悦，并享有一种人道的、文化的生活。所谓“文化”，原本没有太多复杂的内涵，而只不过是人的“文明化”，是我们固有的野性的转换与消除，从而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人道文明的领域。能够保证我们不发生本质的堕落，保证我们无法张狂地随意表现我们所固有的野性欲望，保证我们能够



享有人道的文明生活的那些礼乐制度，包括圣人的教导，就是“人道的文饰”，也即是“人文”。我们是需要这些“人道的文饰”才能过上属于“人”的生活的，所以孟子曾经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禽兽”，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孔子就专门提出一个“仁”字，来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因为在天下的一切事物当中，只有人才具有礼义廉耻，这个“仁”是足以将我们从自然界的全部存在物当中区别出来的唯一标志，这才是“人”的本质特征。因为如此，孟子就将这种属于人的本质特征看作是“人性”，所以他说，人性是善的。仁义礼智这些道德素质，并不是从外界强加到我们头上的，而是原本就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本质当中的，并且它的来源就是天道本身。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原本就有一个“天”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在这种本来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资格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但事实上，我们除了这种从天道那里所获得的道德本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物质性的躯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每天都非常繁忙地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相接触，这些接触会诱导我们产生对外在事物的欲望，而种种名目繁多的欲望又会反过去欺骗我们原本是清明的心灵，这种欺骗的结果，就是心不再“灵”也不再“明”，因为欲望会使它丧失作为身体之主宰的地位，从而遮盖住我们本性的人道光辉，我们原本是善的本性就堕入到黑暗当中而无法显现出来，而这样一来，我们毫无疑问地就会成为“禽兽”，就会从人道的世界当中被完全开除出去。这种状况，正是孔子、孟子都极为忧虑的，他们一辈子都汲汲遑遑，四处奔走，风尘仆仆，席不暇暖，目的只是要挽救世道人心，要将人心从黑暗的沉沦当中超拔出来，而将它导向人道的正大光明，使人性焕发出本有的光辉，而照亮高尚的人生道路，所以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我们必得要循沿着这条仁义的道路，才能寻回我们那被掩盖的、放逸的心灵本



质,才能回归到我们原本是善的本性,才能成就我们作为“人”的生命价值。

理学家在高扬圣人之道旗帜之下,也完全接过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学说。他们充分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性与天道在本质上原来就是同一的。天道的运行有它本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所体现出来的即是“天理”,而天理在人的体现即是人的“性”,所以人的本质即是天理。由于一切万物都必须要有得于天道之理才能获得它的存在,因而理的存在是普遍的,是贯彻、体现于一切万物当中的。正因为理的存在是普遍的而不是有限的,是超越于具体的形式而不是直接诉诸人们的官能感觉的,所以它是“形而上”者;而具体的事物,包括我们有形质的身体,则都是“形而下”者。就人来说,“性”是形而上者,是内在的,它即是我们内心的“天道”,是我们固有的“明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性”需要通过“心”来表达它本身的存在;在这种表达的过程中,“心”可能会按照“性”本身所要求的样子去表达,也可能会因受到欲望的欺骗而背离“性”的本质要求去表达;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具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时是善的,有时是不善的甚至是恶的。在理论上,理学家认为,按照“性”的本质要求去表达的“心”是“道心”,而受制于欲望所表达出来的“心”则是“人心”;前者是本质之天理的自然发越,后者则是人欲用事的结果。所以他们都非常强调“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即是要对“道心”有深刻的体察,而对“人心”进行严格的制衡,从而使“惟微”的“道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充分地显发出来。按照张载的观点,所谓“道心”原本就是我们的“天命之性”,而“人心”则是因身体的“气质”才有的,所以只是“气质之性”;只有“化”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才能纯粹完善地获得真实体现,所以我们学习圣人之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最终至于纯粹天理用事。就“人心”、“道心”的区分来讲,则由于“人心”的实质即是“人欲”,而“人欲”的产生则是背离“道心”的结果,



所以要使“道心”充分显扬出来,“去人欲”就是必要的,所以朱熹就说要“存天理,去人欲”。

如何将人的本善之性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充分地实现出来,使人们摆脱物欲的羁绊,超离庸俗而享有崇高的道德生活,进而成就圣人的品格而优入圣域,其实也即是理学的根本目的。“天道”、“天理”或“性”的本质存在以及“道心”的体察,它实际上是以心灵的自我反思为基本前提的。在反思的状态之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心灵自身存在的真实状态,是没有任何的欺骗隐瞒的,“性”的本质真实正是在这种心灵的反思状态中才得到最为充分的显现,因此是“诚”的。换句话说,“反思”如果不“诚”,那么就不能叫做“反思”。要确保“反思”之“诚”,就必须“敬”,要对我们自己内在的真实本性怀有敬畏,因为我们的本性实际上即是天道本身。“反思”同时也是一种心灵宁静的状态,在思虑纷扰当中,“反思”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唯“主静”才能够“立人极”。所谓“人极”,实也即是天道。“静”中对天理的这种“敬”,就是“对越在天”,就是“慎独”,就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它是心灵本质或天理自然地、真实地呈现它本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体会到一种“反身而诚”的精神愉悦,因为我们的的心灵已纯粹显现为天道,我们已然使天道在我们本身内在地实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而参赞天地的化育。这样一种境界,在理学家看来,就是圣人的境界。德性的内在涵养与外在表现,只是一体两面的事,它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之中是完全可以统一在一起的,但内在的涵养是前提,外在的表现则是涵养的自然结果,“敬以直内”才能“义以方外”,所以他们又强调,“敬”不仅应贯彻于心灵反思的“静”的方面,同时也应该切实地体现于实际的道德践履的“动”的方面,所以程颐说“涵养须用敬”,就是兼动静两方面来说的。“敬”的原则,就是道德的实践原则,它是将我们内在的“明德”扩展于生活实践之中的根本途径。

《近思录》这部书,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主要内容是分



门别类地摘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有关论述,是理学的入门著作,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理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王华宝博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沉潜涵濡,细心抽绎,不惮烦碎,对该书加以详细的注解,并将它译成现代语,实在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对王华宝博士的这一辛勤劳动,我是非常感佩的,并且怀抱着美好的期盼,希望这部书的出版仍能对在当代生活的人们有所裨益!在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渐趋丰裕,我们仍在不懈地追求着物质的富足,享受着物质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腾出一点时间,来反思一下我们的内心是否还保持着“灵明”?我们是否还需要时时唤起我们本性的善美并将它表达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之中?事实上,人的存在的确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除了物质的身体之外,都还有一个心灵,身体需要物质的滋养,心灵则需要精神的滋养。心灵若不时时给予提挈关照,补充滋养,它的源泉就会枯竭,我们的生活就必然会发生颓变。不管物质发达达到何等辉煌的地步,我们平常的生活,仍需依靠我们内在的价值理念的指导,精神境界决定了我们各自的生活世界的品质。在重新提倡继承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新回顾我们文化中的圣人之道义务与责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觉地遵照我们内心的“明德”并自觉地显扬这种“明德”,使这种“明德”在我们生活的实践当中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么辑熙雍穆的全社会的普遍和谐,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会成为一种现实。

是为序。

2006年12月8日于浙江大学哲学系

董平,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陈亮评传》、《天台宗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等。目前主要从事宋明哲学、浙东学派以及中国佛教哲学领域的研究等。